

doi:10.3969/j.issn.1007-6522.2022.01.010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

彭 佳， 严 俊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

关键词：总体符号学；瘟疫；隐喻；转喻；命名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 (2022) 01-0130-11

“我们毋需探求脉搏的跳动，我们探求的，乃是脉搏不同跳动方式的指意。”

——塞尔苏斯，《论医学》(Celsus, *On Medicine*)^{[1]8.1}

尽管符号学一词是索绪尔迟至 1907 年在日内瓦大学教授语言符号学课程时才提出的概念，但对于这门学科的逆向追溯，却是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思想，包括希波

克拉底和其后的盖伦建立的症状学紧密相关的。希波克拉底认为，对疾病的预判是医生从对符号的观察、认知和推论中得出的，医者必须参照过去的经验，辨认出疾病在病人身体上的表征，从而推断疾病未来的发展可能。这一观点，在《希波克拉底全集》的《流行病篇·之一》中被清楚地阐释出来，其符号推论之方法被认为是遵循了演绎法的

收稿日期：2020-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90)

作者简介：彭佳(1980-)，女，四川泸州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符号学、艺术批评。

严俊(1980-)，女，江西新余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本原则。^[2]由此可见,对疾病尤其是流行病的认知和书写,在符号学研究萌发之初,就已经被纳入了其研究范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本文试图讨论,瘟疫这一符号在文学中是如何被建构出多重意义的,并将其放置在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框架中,借此反思在全球的生命符号域(global bio-semiosphere)越来越一体化的背景下,瘟疫应当如何被重新书写。

一、导言:何为总体符号学?

总体符号学^①是著名符号学家西比奥克于2001年提出的理论构想,其基本观点乃是符号学范畴无远弗届,是一个包含了从人类使用的符号到生物信号的宏大界域;而作为研究方法的符号学,具有整合不同学科边界的能力。首先,这一概念传承了皮尔斯将整个宇宙视为充满符号之所在的观点,以保留符号学对未知的星球和空间中可能的符号进行研究的可能;其次,尽管泛符号论不能等同于符号帝国主义,不能被视为通用于任何学科的万能公式,但其跨科学的倾向,从符号域理论与生命科学和物理学的交光互影,到符号动力论对语言学到热力学乃至生物学模型的整合,其表现都相当出色。

然而,global一词确有全球之义:西比奥克自己,对于在全球学术理论的历史脉络中整合符号学资源,建立完整的符号学学科版图,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事实上,在《总体符号学》一书中,他在开篇就声明,总体符号学

一词的最初构想,来自著名数学家雅克·阿达玛的《作为统觉的发现:符号之助》(“Discovery as Synthesis: The Help of Signs”)一文,在该文中,阿达玛声称自己意图建立“一个整体的概念”,以概括那些书面的和口头的、视觉的和动觉的交流。^{[3]vi-vii}而global一词本身是多义的,意味着“无所不包的”(all-encompassing)、“综合的”(comprehensive)、“国际的”(international)、“无限的”(limitless)、“全球流行的”(pandemic)、“无界的”(unbounded)、“广泛的”(universal)和“宇宙的”(cosmic)。^{[3]1}西比奥克声称,“global semiotics”的首要含义,是他自1975年来一直提倡的一个概念,即符号之网(semiotic web),他强调这个网络的整体性,它对所有物种之间、对生命与环境之间广泛的符号关联之囊括。^{[3]2}然而,总体符号学这一术语是多重维度的,如西比奥克所说的,它“包含着几层鲜明的、毫不含糊的内涵”,不仅意味着对物种、学科、符号类型的跨越,还具有以下意涵:“地理政治上的”,因为“在最普通的意义上,‘global’指的是符号学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地理疆域上加速度地发展”;“时间上的”,因为符号学历史的“历时考察也是至关重要的”。^{[3]xvi}可见,总体符号学本身的面向,它的总体性中,就已然暗含了对全球性的论述;只不过在学者们对总体符号学的讨论中,全球性这一维度没有得到特别的凸显罢了。例如,帕布尔就将总体符号学放在皮尔斯符号学的大传统中,和索绪尔符号学的小传统相

①国内学界将global semiotics译为总体符号学,就笔者所见,首位译者应是周劲松在科布利主编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做出的翻译。至于为何不译为全球符号学,周劲松在给笔者的邮件中如此解释:“总体符号学,指的是符号界域广大,‘渗透整个宇宙’(皮尔斯),尤其是西比奥克之后,这个概念更是被推广至无限。”周劲松的这一理解,符合西比奥克建立总体符号学之初衷,特此说明。

比较,这种总体性的、包含多种类型符号的研究才适应当代的传播学发展。^[4]科布利的看法与此相似,他写道:“语言同所有有生命的细胞之间发生的一切互动所产生的整个系列的符号相比,实在太小了……属于主流的、皮尔斯传统的许多符号学家,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下,把符号活动看作‘标准的生命属性’(critical attribute of life),因而是在‘总体性的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之中看待符号。”^[5]

与此不同的是,佩特里利和庞齐奥强调,应将总体符号学放置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语境中来看待,他们的研究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造成了符号活动的同质化,为总体符号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地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双重批判视阈。^{[6]3-22}而将灾难和总体符号学之多重意涵联结起来的是张汉良借2004年印度洋海啸而生发开来的灾难符号学研究。^①作者沿着皮尔斯的三元符号结构渐次展开论述,铺陈出灾难的符号传播过程在自然和社会维度上的总体性与全球性,因而诘问道:何以由全球的环境危机、人口流动、各种符号活动之网交织而引发的灾难,未能成为符号学研究应有的关注点?^[7]同理,瘟疫作为灾难和疾病,其全球性的特征是如何被符号所表征的?其意义有无流变?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将在总体性和全球性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对瘟疫文学中的命名与修辞的探讨。

二、污染的隐喻 瘟疫的词源学表征

瘟疫一词的来源是多重的:它可能源于拉丁文 *plāga*, 原来的含义为“击打”和“创

伤”;或是拉丁文 *plāngere*, 意为“击打”或“哀悼”;在4世纪的拉丁文版《圣经》中,“*plague*”一词被用以表示瘟疫之义,其后又用于尤指腺鼠疫,即在中世纪席卷了欧洲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可见,瘟疫首先是被视为一种灾难,是神的击打:灾难降临,是因为人的不义引发了神的降怒。的确如此,在《俄狄浦斯王》的开篇,索福克勒斯就借祭司之口,描述了瘟疫作为神的击打并带来深重哀痛的景象:“正如你亲眼所见,我们的国家,像一只航船,遭遇血的狂澜,虽经拼命挣扎,但还是被一个巨浪卷进了深渊,再不见它露出水面。在这里,田里抽穗的庄稼枯萎了,牧场上吃草的牛羊倒毙了,临产的妇人突然死了,最可怕的瘟疫,那个手持火把的恶煞凶神,突然降临我们城邦。于是,卡德摩斯的家园荒凉一片,黑暗的冥土到处是痛哭和悲叹。”^{[8]239}瘟疫的产生是“手持火把”的恶神带来的灾难:在这里,医学意义上作为疾病的瘟疫,被视为神降下的灾祸:不止动物与人染病暴毙,植物也枯萎死去;和其他疾病不同,瘟疫席卷而去的,是所有的生命存在,这和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毁更为接近。正因如此,和被当作“天谴”的一切灾难类似的是,瘟疫的源头被认为是神对人之恶的震怒与惩罚。在《俄狄浦斯王》中,大神福波斯对瘟疫的解释即是“血债不曾得到偿还”,因此,需要“消除那污染忒拜土地的病害,若让它留着,我们便无药可救”。^{[8]243}这一段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论述,与现代科学的认知相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常有,并且,动物和昆虫常常是携带和

①该文为张汉良2005年6月在芬兰伊玛特的国际符号学研究所举行的“Global Semiotics”会议的发言稿,后收入作者2013年出版的个人文集 *Signs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中,因此,该学说的提出时间为2005年,即西比奥克正式提出这一术语的四年后。

传播病毒的宿主,但宗教文学中描述的种种瘟疫的异象,如血海翻腾、植物枯萎死去等等,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被否认了相关性,很可能只是出于古人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狄浦斯王》中,已经出现了病源学意义上与瘟疫紧密相连的污染一词:找到污染健康群体的病源,并将其隔离,向来是消除瘟疫的基本手段;尤其在微生物学尚未出现的古代,阻隔病患,基本上是唯一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防疫方法。瘟疫是健康、清洁、圣洁状态的反面,要维持生理、社会 and 道德机制的正常运转,必须将其阻断、驱逐和消灭。

《俄狄浦斯王》中描写的瘟疫,是否是以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为背景,相关考证繁多,但并无定论。^①然而,和《圣经》中描写的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的埃及和以色列的灾祸相比,雅典瘟疫确实被视为有别于其他疾病和灾祸的瘟疫,因为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明确地描述了席卷雅典的疾病在短期内表现出强烈的传染性,他强调和病人密切接触的医生以及啃食死者尸体的动物,都大概率地被传染;尽管疾病如何缘起和传播不得而知,但作者排除了投毒的可能,将其描述为一种在人际和动物之间可以相互传染的可怕病症。^[9]从书中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已经对瘟疫与其他疾病的显著区别,即它的可传播性,有着清楚的认知,并且已经开始使用高温和隔离的手段来试图阻止瘟疫的传播。与古拉丁词“plaga”同义的古希腊词“Loimos”,对这种“危害的可传播性”有着清楚的描述:该词最早见于德摩斯

梯尼(Demosthenes)的演讲《反阿里斯托格伊》(“Against Aristogeiton”)一文,用以描述“一个有害的人”,^[10]认为此人的行为会危害城邦;作者在另一篇演讲《论假信使》(“On the False Embassy”)中,则以此形容“在希腊流行的可怕疾病”。^{[11]384}可见,瘟疫一词在语义层面上,强调的是有害的传播。而污染和瘟疫的相同之处,也在于这种可传播性:“pollution”一词源于拉丁词根“pollutionem”和“pollutes”,原来的含义为“脏污”,在古英语中表示“通过生理的、道德的、精神上的污染或不洁让人及其信仰和象征变得污秽”;而在中古英语中,其肮脏的可传播性和不伦之性行为发生了勾连:“pollution”还意味着“阴道性交之外的射精”。^[12]瘟疫和污染作为正常、健康、清洁的反面,在语义上发生了高度的重合:在生理、社会和道德层面,莫不如此。在个人生活被宗教话语挟裹的基督教文化中,纯医学方式的书写被覆盖了,宗教修辞成为了瘟疫文本的主要符码,这当然和医学的发展程度有着重要关联,但其更深的根源恐怕在于其语义学层面:乃是语言深层地建构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三、罪的转喻 瘟疫作为 人神关系座架中的总体性符号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桑塔格指出,疾病的隐喻能够以正当的名义实施暴政,以达到控制和管束的目的。^[13]对此,张桃洲写道:“在隐喻的作用之下,疾病的本性消失了,被掩埋在厚厚的悬浮物内,代替疾病出

①关于《俄狄浦斯王》的确切上演时间是在雅典瘟疫之前还是之后,目前尚无明确结论。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该剧的时代背景很可能是在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700年之间,但由于古希腊戏剧有着将史诗时代的故事与创作时的历史文化现象相融合的倾向,《俄狄浦斯王》中对瘟疫的描写很有可能来自雅典瘟疫的实际场景,体现出创作者所在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瘟疫的经验、想象和知识结构。

场和引起注意的只是文学化想象堆砌的意义外壳。”^[14]在前现代文学对瘟疫的书写中,和污染同源的瘟疫之缘起,往往是人的罪恶与不义:这和当时的科学发展程度当然有着直接关系,但更多的,应当将其放置在以人作为神掌管下的世界之灵的想象图景中加以审视。

米凯拉基斯从修辞的两个方面论述了古希腊文学中的瘟疫,他的观察为文艺这一符号表征的总体性提供了双重的视角。其一,对瘟疫的描述是拟人化的,这一手法“使得瘟疫能够被映射到和人相对的神、动物和无生命之物这些在本体上截然不同的范畴内”。^{[11]383}通过将瘟疫这一本来非人化的主体加以神格化、动物化和具象化,叙述者不仅对瘟疫予以赋形,还建立了全知视角中的微叙述,其“积累的效果并非……对总体叙述的打断;相反,正是这些叙述构成了不同的毁坏行为之相互交织”。^{[11]385}如是,人作为对想象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双重描述者,在语言世界的层面,完成了对这两个世界的总体性整合;瘟疫就不仅仅是被经历的,还是被想象的、被“总体性地再现的”对象。就如帕克森所说的,对瘟疫的拟人化,使得非人格的自然现象被“局部地赋予有生命力的隐喻”,由此联结了“所有语言活动都涉及的认知的普遍化”。^[15]在人类以语言为基本的模塑(modeling)机制建立的周围世界(Umwelt)中,对象的表征符号得以在符形(syntactic)的层面上被替换为其他符号,包括纯然想象性的符号,由此,想象的世界和经历的世界才在语言中得到总体的整合。就这一点而言,人类由符号建构的周围世界的总体性,也意味着诠释的自我视角:正是人类的主体性自我,才将对象安置在总体性的、多维的语义网络之中,为其建立了多重意义的可能。其二,在瘟疫文学

中,有着大量的转喻修辞,将人类个体和群体相连,与其他生命相连。在因罪受罚、在污染和净化的意义上,个人、人群整体和生命网络的关系是转喻式联结着的:这是叙述情节能够在像《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故事于全景和个体之间移动的基本要素。^{[11]391}前文已经指出,在《俄狄浦斯王》里,主人公的罪行使得植物、动物和全城人都受到神的击打:整个世界是在人神关系的主座架上得以整体性地安置的。实际上,这种转喻式的世界安置,是几乎所有宗教之灾难和瘟疫叙述的共同要素:《圣经》中上帝所降的埃及十灾,包括生物灾害(蛙灾、虱灾、蝗灾),瘟疫(泡疮灾),自然现象(冰雹灾、被视为“黑暗灾”的日食)和想象中的、神秘化的灾害(长子灾),皆是因为“法老心硬”,不肯放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诺亚逃离的大洪水,也是因为众人行恶惹出神之暴怒,地上的全体生命都遭受了毁灭之灾。宗教的尤其是基督教的集体叙述,本质上就是转喻性的:个人的罪行由整个群体即所有生命体来承担,有了这一逻辑基础,因着诺亚的义行,人类和其他生命体才有躲进方舟、避过灾难的机会;耶稣也才能够用个人的自我牺牲实现对人类的整体救赎。在《圣经》之开篇《创世纪》中,人类就是被作为上帝对世间万物的代管理者被创造出来的,因《圣经》云:“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16]尽管人是最后的被造物,但却是将被创造的万物整体性地和神相联系的纽带: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意义世界观,反映的是古代人类对世界的主体想象。瘟疫文学中的转喻式

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主体想象为基础的。

笛福的《瘟疫年纪事》,虽然相对而言是较为晚近的文学作品,但这部作品把这种将人类主体置放于上帝辖制之下的生灵之首的世界观也表现得相当鲜明。就如张惠慈所指出的,笛福塑造的主人公H.F.“一方面相信宗教论述,认为瘟疫来自于神对世人作恶的惩罚”,^{[17]111}认为人虽为上帝选中的管辖万物之生灵,但却自行其是,招致了神对整个世界的击打。很显然,这和《创世纪》《启示录》的修辞逻辑是类同的:“我们不要去指望,那些内科医生能够阻止上帝的判罚,或者说能够阻挡一场显然是由天国武装起来的瘟疫,执行它被派遣的那个使命。”^{[18]80}另一方面,主人公“又相信医学论述,认为疾病来自世俗人物接触的传染”。^{[17]111}因此他说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这场灾难是通过传染性病毒蔓延的,也就是说,是通过某种水汽,或气体,而内科医生称它为恶臭,经由呼吸或汗水,或患者脓疮的臭气,或某种其他途径……而我不能不带着几分惊奇,发现有一些人,在这场传染病现已终结之时,把它说成是来自上天的直接打击,无须通过中介的作用,奉命打击这个和那个个别的人,而非其他任何人;由于这种观点是出于明显的无知和狂信,我对此不屑一顾。”^{[18]132-133}在这里,瘟疫的修辞已经有了一个转义滑动:传播瘟疫的中介,开始被视为上帝击打世界的手段;这一隐喻框架,自然源于科学进步带来的观念改变,人类的罪行固然是招致污染的根源,但污染的传播,却有着隐秘的媒介,而疾病也可以通过“征象”(笔者注:即表征)被观察到。然而,尽管彼时的叙述者已经开始思考瘟疫通过未知的中介来进行传播的可能性,但科学和观念的局限,却阻碍了当时的人们继续追问这种中介具体是什么,并由此正视

瘟疫传播的全球性并非某地之原罪的事实。因此,尽管观察瘟疫的“征象”“成为了生存的必需”;然而,“征象”的意指在明确地指向具体的、已受到污染的对象时,却无法根据符号系统的差异性排除另一些对象,就如沃尔在《瘟疫年纪事》的导言里所说的:“因为所有如此稳定地指向某种现实、某种事实(一个受到传染的人、一座受到传染的屋子、一个受到传染的城市)的征象同时正好是亏欠意义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没被足够标志出来。门上的十字或许可以担保那户人家‘受到访问’了,但你又如何知道隔壁没有标记的那座房子呢?”^{[18]18}征象本身作为指示符,只能指向已经发病的个体,而无法对污染的源头或媒介提供明确的索引性。瘟疫之源头和传染媒介不可确定,却能在极为广阔的地域上蔓延,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毁灭性的大规模死亡;因此,在对瘟疫的书写中,对这种全球性的流行病的局部界定与区隔,成为了对瘟疫之别名生产的一个基础。

四、命名之流变:全球性维度的显现

前文已经指出,正因为瘟疫是一种需要从道德和社会层面都被清除的污染,对它的命名,也在人种、阶层和地域的语义层面投射出转义转折的修辞意味。命名作为符号行为,并非中立的、透明的,而是权力关系、歧视和等级制度的表征。在对传染性的疾病和灾害的命名尤其是非正式的别名设定中,通过将病症和灾难与特定的地域或阶层之间设置转喻式的联结,将疾病、灾害归咎于某一人群,实现与其生产源头的切割。譬如,曾在19世纪给伦敦市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灾难性毁坏的大雾,又被称为“豌豆汤雾”,只因“豌豆汤”是下层民众普遍食用的廉价食物;尽管豌豆汤的黄褐色与“伦敦雾”

的深黄至灰黑并不完全相符,这一称谓却成为了伦敦上层人士将自己和“伦敦雾”之污染源切割开来的绝佳修辞。^[19]正因为疾病尤其是瘟疫的流行不分国界,人们在为其命名时常采取冠以地名的做法,以表明自身与其源头无涉:从意指层面而言,这是用于区隔污染的最为常见的策略。根据海登的研究,梅毒这一从15世纪起逐渐蔓延至全球并且相当长时间内无药可治的传染病,就被那不勒斯人称为“高卢病”“法国病”,而被法国人称为“那不勒斯病”。与之相似的是,在日本它被称为“中国溃疡”,而在中国国内则被称为“广东疹子”。而德国人则将其命名为“西班牙痒”。不止如此,由于梅毒的主要传染途径之一是性传播,意味着“不洁”的女性尤其是妓女,被视为最初的传染源:梅毒作为“女性病”的类别由此而来。^[20]命名作为分类这一符号行为的第一步,本身就是隐喻性的,是旨在脱罪与转嫁责任的说辞。在分类的符号体系中,以地域性、族群性、阶层性命名的流行性疾病与灾害,是指向其修饰性定语之意指的指示符:按皮尔斯所言,指示符往往可以直接、有力地作用于符号接收者,引起动力性的反应。^[21]此种指示符并非将符号接收者的反应引向对象,而是使其远离和驱逐对象,在符号构成的语言世界和实践的生活世界中都确立边界:而边界意味着权力的建立和对外来的、危险的、不祥的要素的排除。从这个意义而言,人们对瘟疫的态度不仅不是全球维度上的,还是反全球的:因污名化而被区隔的地域、被驱逐的人群,正是这种基于自我保护的地方意识对瘟疫的动力性反应。

语言与现实世界有着相互映射的关系:语言及修辞不仅是世界的再现,它反过来也模塑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就如莱考夫等人

所说的:“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22]而疾病与污染作为概念隐喻,为人们对实体的认知提供了基本的框架。1997年席卷中国香港、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金融危机被称为“亚洲流感”(Asian Flu)或“亚洲感染”(Asian Contagion),就揭示了在“疾病/健康”的隐喻框架内放置国家经济与跨国贸易之关系的思维方式。^[23]¹以此为线索,哈里斯检视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外来身体”的病理化修辞是如何在全球关联的贸易活动中置放和处理国家经济之主题的。他发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瘟疫不仅仅被视为污染和疾病,被视为神之天谴,一种“体液的不平衡状态”“有害的入侵”“上帝的行为”,还被当作“穿越自然和政治肌体之边界的非连续性实体”。^[23]¹⁰⁸这种“瘟疫的实体论”将外来药物和商品视为可能具有污染性的载体,并引发了对外来经济入侵国家肌体的伦理焦虑。^[23]¹²⁰⁻¹²⁵瘟疫,这一由细菌和病毒在生物体间的生物符号传播过程中引发的疾病,经由语言的映射,形成了各个层面的隐喻:生命维度上的,全球网络中的,具象的身体和抽象的概念上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意义上的。在《瘟疫年纪事》中,伦敦瘟疫的消息被竞争国歪曲和夸大,谣言四起,导致来自英国的船只、货物都被转喻式地赋予了污染物的寓意,伦敦乃至全英的商业贸易都遭到巨大打击:“噩耗传遍了整个世界,说伦敦城染上了瘟疫。”^[18]³²⁷“我们生产的制造品和货物,在国外不会被人碰一碰;他们跟害怕我们的人一样,害怕我们的东西……有一则传言说,我们有一艘船偷偷摸摸交了货,这当中有几包英国布料、棉花、粗绒布以及类似的货物,那些西班牙人便让人把所有货物都给焚烧了,把涉及将它们带上岸的人处以死刑。”^[18]³²⁵地域性的封锁,

素来是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手段;然而,对疫情的起源地之追溯,却向来是对某地之原罪的推溯过程。作者写到,伦敦的居民纷纷将瘟疫的源头归为别国,包括荷兰、意大利、中东地区、土耳其等等。在语言符号的层面将自身和污染隔离开来,是瘟疫修辞的首要策略;这与实践上的区隔行为是相互呼应的。

笛福写作《瘟疫年纪事》的时代,微生物医学还远未形成,人们仍然将瘟疫和自然灾害相并置,将气候、动植物活动之异象和病人的身体症候,都作为判断和指示瘟疫发生的符号。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细菌研究的兴盛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检验武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微生物,作为检验瘟疫是否已经产生的指示符,成为了从来无影、去无踪、毫无规律可循的瘟疫之新“征象”。这一“征象”是由科学符码所建构的,多采取以发现者姓名为其命名的做法:瘟疫的名称不再是污染与罪,或者地域、阶层的转义修辞,而是意味着科学发现之荣光。如果说辞格是话语的“活的使用之后设语码”,^[24]那么,这一新的后设语码,就是以科学话语代替了原有的宗教话语。例如,法国作家派翠克·德维尔的小说《瘟疫与霍乱》,就讲述了14世纪以来在欧洲持续爆发的黑死病于1894年在中国香港爆发,包括北里柴三郎、叶森等来自各国的细菌学家在相互竞争中发现鼠疫杆菌(其拉丁文名称为叶森杆菌 *Yersinia pestis*),由此确定了肺鼠疫之元凶的故事。德维尔以一位经历全球化浪潮的当代作家的视野,在对这场瘟疫的背景铺陈中,将过去、现在、未来穿插,展开一幅全球性的瘟疫图景:“中国的一场瘟疫向下往越南东京蔓延,五月时扩散至中国香港。死神的镰刀在远方步步逼近,很快就要

大开杀戒了,九龙的英国人和海防的法国人,以及每个与中国通商的港口,皆恐慌不已。在那个步行、骑马、牛车轮子吱嘎作响、用风帆航海的时代,瘟疫一步步向前推进,所经之处不留活口。14世纪就有两千五百万人因瘟疫死亡,身穿白袍的医师戴着长鸟嘴式的白色面具,里面塞满香草以过滤瘴疔之气。瘟疫的可怕程度与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形成正比,瘟疫期待蒸汽、电力、铁路以及铁壳船的发明,在可怕的黑色瘟疫面前,再也看不到长柄镰刀,再也听不到稻秆上嘶嘶的收割声,而是耕耘机在麦田中央全速前进的画面。瘟疫无药可救,瘟疫在毫无防范下出现,必死无疑,很容易传染且令人摸不着头绪。瘟疫散布丑恶,散布死亡,在淋巴腺肿遍布身体的黑色或黄色汁液中扩散全世界。”^[25]123-124

这段论述从1894年中国香港鼠疫发生前的时间截面切入,回看了黑死病几百年间在欧洲荼毒生灵的情景,以交通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为背景,勾勒出瘟疫遍及全球,并猝然降临在中国香港这一人口密集、各色人等杂糅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中的可怖态势。然而,幸运的是,随着结核杆菌、白喉杆菌接连被发现,细菌学家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致病菌与传染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们齐聚中国香港,致力于寻找引发鼠疫的元凶。在叶森代表的巴斯德派和北里柴三郎代表的科霍派的竞争中,前者更为幸运地捕获了鼠疫杆菌这一肆虐数百年的病菌。当写到叶森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时,德维尔特地将这一发现的拉丁文名称郑重其事地以单行的形式标在文中:

我很快就做好制备样品放在显微镜下面,第一眼就发现一团确定为微生物的东西,而且每一个都很相似,尖端圆圆的、粗短

的小棍棒。

……

从未见过父亲、未来也不会当上父亲的叶森,起码受到肯定成为公认的病菌之父:

叶森杆菌(*Yersinia pestis*)^{[25]126-127}

在此,强调罪与污染的宗教话语终于让位于科学话语:对瘟疫之致病菌的命名不再使用地域性的或是人群性的隐喻,而是明确的指示符、身份的确证,指出了发现病源之人。这一科学的命名法,在能指的形式层摆脱了罪与污染的隐喻框架,在内容层脱去了联接性的转喻框架,用清楚的直指确认了发现者对病菌的发现权,其蕴含义并非耻辱,而是耻辱的反面:承认、肯定与荣光。

至此,瘟疫的书写者们终于意识到,面对这遍布全球、毒性甚烈的病菌,驱逐被污名化的人群是反人道的,因为这个星球的人类本身,是整体性的命运共同体。德维尔敏锐地揭破了彼时人们借“瘟疫之源”的罪名驱逐犹太人,和德雷福斯事件中对犹太人的政治迫害,都是否认全球、全体人类和生命之相关性的表现,他写道:“就像从前人们指责犹太人散布瘟疫一样,这次犹太人又被怀疑策动战败及背叛法国。……‘大家拼命攻击犹太人,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今日反犹太主义还是占了上风。’”^{[25]133-134}然而,致病菌和战争一样,并不会因为国籍身份、确立的国界,就对任何人、任何地区予以豁免:唯有当来自不同地区的科学家们相互合作,才能发明出能够对抗传染病的疫苗,改写人类的共同命运。从这个意义而言,引发瘟疫的细菌与病毒的活动,对瘟疫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科学研究与考察,商业贸易,医学救治……各种类型、各个物种、各个地区的符号活动总体性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地呈现在文本之维和现实之维。正是由于对瘟疫之致

病性的缘由有了新的认知,曾经被视为罪与污染的瘟疫,才得以重新被审视和打量:它的传染性使得区隔仍然是最为重要的防御手段之一,然而,这种区隔不再是将作为替罪羊的某个地域和人群以污名化的方式隔断、驱逐,而是为了全球性的、整体的人类福祉的自我牺牲。从这个意义而言,总体符号学视角下的瘟疫书写,最终呈现出全球性的面向:就像加缪在其著名的小说《鼠疫》中所写的那样,在主人公里厄大夫向省长报告了他从病人淋巴肿切片中找到的“传播鼠疫的粗矮形杆菌”之后,他意识到,“必须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阻止瘟疫蔓延”,^{[26]61}并随之迎来了电文:“全城封闭”。^{[26]63}这样的封闭,绝非对罪的隔离,而是在审视了人类命运之全球性与整体性之后做出的巨大的自我牺牲:正如加缪本人所说的:“没有人能够平静地死去,如果他不做使别人能够活着的一切的话。”^[27]用总体符号学在西方最旗帜鲜明的继承者、伦理符号学的提出者彼得里利的话来说,因为在这整个星球构成的生命符号网络中,人类负有终极的伦理责任,在全球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所有生命体的命运相连,“凡属符号,‘我皆有之’”,^{[6]547}瘟疫的命名、病征的指示符、对瘟疫的书写……都是在这个全球相连的生命符号网络中的符号活动,如何超越同一性的逻辑,超越“归属、相邻和社群逻辑的限制”,^{[6]547}成为人类这一唯一具有符号反思能力的生物能够以总体性和全球性的伦理考量去重新思考的问题,是总体符号学应当深入探索的议题。“符号学必须采取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全球的’(planetary),也就是时空意义上的总体(global)视角,才能充分理解当今世界的交流。”^{[6]537}的确如此,尤其是在地域性的偏见与恶意借着自媒体延续和复苏着远古宗教

话语对瘟疫的污名化修辞时,如何重新建立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值得符号学研究者进一步深思。

参考文献:

- [1] Celsus. On Medicin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8.1.
- [2] Hippocrates. Of the Epidemics [EB/OL]. (2015-08-03) [2020-03-02]. <http://classics.mit.edu/Hippocrates/epidemics.1.i.html>.
- [3] 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 Adrian Pablé. Global Semiotics vs. Human Semiology: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J].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6(1): 25-43.
- [5] [英]保罗·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M].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 [6] [意]苏珊·彼得里利,奥古斯托·蓬齐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超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M].王永祥,彭佳,余红兵,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7] Han-liang Chang. Disaster Semiotics: An Alternative 'Global Semiotics'? [M]// Han-liang Chang. Sign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690-706.
- [8]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喜剧集(上部)[M].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9]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谢德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7-142.
- [10] Gunthe Martin. Divine Talk: Religious Argumentation in Demosthen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68.
- [11] Pantelis Michelakis. Naming the Plague in Homer, Sophocles, and Thucydid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9(3): 381-414.
- [12] Mehael A Cham. Etymology and Use of the Term "Pollu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 2011 (S2): 5-8.
- [13] [英]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14] 张桃洲.拆解与还原:从隐喻后退[J].书城,2004(8): 56-59.
- [15] James J Paxson. The Poetics of Personification: Literature, Culture,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33.
- [16] 无作者.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M].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1.
- [17] 张惠慈.狄福《大疫年纪事》中神/人与宗教/理性间的对话[J].中外文学,2005 (7):111-143.
- [18] [英]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M].许志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19] Christine Corton. London Fog: The Biography [M].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44.
- [20] [美]德博拉·海登.天才、狂人与梅毒[M].李振昌,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34.
- [21]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66:3.419.
- [22] [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
- [23] Jonathan Gil Harris. Sick Economies: Drama, Mercantilism, and Disease in Shakespeare's

- England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24] 韩蕾. 论巴尔特: 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177.
- [25] 派翠克·德维尔. 瘟疫与霍乱 [M]. 林伟君, 译. 新北: 卫城出版, 2014.
- [26] [法] 阿尔贝·加缪. 鼠疫 [M]. 李玉民, 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 [27] [法] 卡特琳娜·加缪, 马塞尔·马哈瑟拉. 孤独与团结: 阿尔贝·加缪影像集 [M]. 郭宏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7.

Double Dimensions of Global Semiotics: Starting from the Naming and Rhetoric of Plague

PENG Jia, YAN 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Global Semiotics, a conception put forward by Thomas A. Sebeok, is all-encompassing and planetary. Its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all signs of bio-semiosphere. The symptoms, the naming and rhetoric of plagues and writings on them are all important topics in global semiotic studies. Plague is a metaphor of both “pollution” and “crime” in the light of etymology, and designates an isolated, segregated or expelled object in terms of semantics as a result of its metonymic connection with a specified locality or community. Ye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al science, the naming of and writings on plagues have been reexamined in the all-encompassing and planetary life web which consists of all creatures: human beings, animals, plants, microorganisms, etc.. The meaning generation of plague as a sign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metaphorical frame in religions, but a topic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 semiotics.

Key words: Global Semiotics; plague; Metaphor; Metonymy; Naming

(责任编辑: 魏琼)